

# 父亲钢笔上 烧焦的洞

□俞建雄 文/摄

我人生中第一个科学实验的对象，是父亲那支珍贵的“浪琴”钢笔。而实验的代价，是它身上那个再也无法抹去的烧焦的洞。

那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。一个寻常的星期天，一位高年級的伙伴神秘地告诉我，他刚学到一个“物体热胀冷缩”的原理。“知道吗？要是瓶盖拧不开，用火一烧，准行！”这句话，像一粒火种，落进了我好奇的心田。

从此，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疯长：我一定要亲手试一试！可家里的瓶瓶罐罐都引不起我的兴趣。不知怎的，我的目光，最终落在了父亲那支从不许我碰的“浪琴”钢笔上。

那支笔是父亲的“宝贝”。黑色的笔身，银白色笔头正中间刻着“浪琴”二字，笔杆尾部有个精巧的旋钮。在我眼里，它不光是写字用的，更是一件充满奥秘的宝贝。

机会在一个午后降临。父亲去自留田了，母亲在灶间忙碌。我心跳得厉害，像做贼一样溜进里屋，从父亲挂着的旧中山装口袋里，小心翼翼地摸出了那支笔。接着，我又偷偷拿来煤油灯，取下玻璃灯罩。一切准备就绪。

我紧紧拧上笔杆的尾套，深吸一口气，划亮了火柴。橘黄的火苗蹿起，映得我心里七上八下。我捏着钢笔，将笔杆

尾部慢慢凑向火焰。那一刻，我能听见自己怦然的心跳，既怕母亲发现，又盼着见证奇迹。

突然，“噗”的一声，笔杆尾部竟蹿起一簇火苗！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慌忙丢开煤油灯，手忙脚乱地拍打着笔杆。火灭了，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弥漫开来。笔杆上，一个黄豆大小的焦黑窟窿，赫然在目。

我闯大祸了！

我赶紧找来橡皮膏，像包扎伤员一样，把那个洞仔仔细细地贴好，然后战战兢兢地把笔塞回父亲的口袋，心里默默祈祷能瞒天过海。

然而，第二天，父亲工作时就发现了。那顿晚饭，我吃得索然无味。终于，父亲举着那支贴着橡皮膏的钢笔，平静地问：“这笔，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埋着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，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验的经过。说完，我紧闭双眼，等待着一场暴风雨。

谁知，预想中的责骂并没有来。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拿起笔，端详着那个烧焦的洞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“原理是对的，但方法错了。”他放下笔，看着我说，“塑料、胶木这些物件，遇火就着，这个道理你今天算是记住了。下次想试，应该用热水。”

他非但没有责怪我毁了他的心爱之物，反而就着我的“败绩”，给我上了一堂更珍贵的科学安全课。末了，他语气温和却郑重：“往后做这种带点危险的试验，要先问问大人。我们经历得多些，能帮你少走弯路，避开危险。”

那一刻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，心里涌起的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。一支钢笔的金贵，我算是懂了，但父亲用他的宽容让我明白了：一个孩子的好奇心、探索的勇气，远比任何有形的物件更加珍贵。

那个烧焦的洞，最终随着那支钢笔，在往后的岁月里遗失在某次搬家的途中。但父亲在那天晚上给予我的理解、宽容与智慧的引导，却深深地刻进了我的生命里。后来，我报考了师范的物理专业，成为一名科学老师。我常常想，那颗理想的种子，或许早在那个因慌乱点燃了火焰的午后，就被父亲用最温柔的方式，亲手种下了。

## 巧遇

□赵志邈

生活中，巧遇的事并不多，一旦遇上，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。我第一次出远门的经历正是如此。

那是1976年4月，我受单位委派，独自去厦门和汕头考察和学习。出远门，最担心的莫过于买不到车票和找不到住宿。不过，这回买车票的运气还不错，我在杭州和鹰潭二次中转，都顺利买到了车票，最后，如愿乘上了鹰潭至厦门的卧铺列车。

列车晃晃悠悠，一路南下。起初，从车窗内向外望，视野开阔，春意盎然，旖旎风景尽收眼底。但很快列车驶入崇山谷地，还时不时出入隧道，先前的旖旎风景一扫而光。由此，实际24小时的车程，让人感觉更长。期盼中，列车终于抵达了厦门火车站。我赶紧顺着人流下车，心里想着快点去找住宿。

出了站台，我东张西望，想找人问一下路。突然，我看到出站口有人举着写有“全国渔业机械会议”的牌子接人。这自然与我无关。但作为一名水产从业者，这牌子对我竟有了吸引力。鬼使神差，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它走去。

走到牌子边，我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姚科长吗？原来，他是这个会议的参会代表。我兴奋不已。然而，此前我与他并无交集，他甚至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。“姚科长！”我冒昧与他打招呼。“你是我们公司冷冻厂的吧？”他惊奇地问。我说：“是的，我来厦门学习。”“那好啊，我们可以做伴了。”他即刻邀我和他一起去开会的酒店住。我说：“这行吗？”他说：“应该没问题。”看他有点把握，我也不再多问，赶紧跟他上了车。

结果如他所料。我们下车后，进到名为鹭江大厦的酒店，顺利办理了入住手续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，心想，碰到姚科长还能和他同住一室，是缘分吧。

第二天，我乘公交车来到厦门市水产公司，开启了我的考察和学习。那时，国企间合作多于竞争，我的考察和学习自然很顺利。其间，我还去了汕头市鱼露厂，同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。5天下来，我已如期完成了任务。而此时，姚科长他们的会议也接近尾声了，所以，我打算和他一起回宁波。

但次日，我接到单位通知，要我尽快去三明与同事会合。这样，我只好取消了三明的火车票。

想着很快就要离开厦门，我心中不免有点留恋，于是，再次登上鼓浪屿游览。我沿着绿树成荫、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兜了一圈，似乎在为这次来厦门的使命画一个句号。

傍晚，我告别姚科长，准时坐上了去三明的卧铺列车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回我又碰到了一位同行。她看上去像农村老妇，但真实身份却让我刮目。她告诉我，她姓骆，是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的研究员，这次来厦门参加渔业机械会议，现在会议结束，顺便去三明看望姐姐。“正巧，又是参加渔业机械会议的！”我心想。于是，我们聊了很多，直到晚上10点多钟。

凌晨3点多钟，我在睡梦中被骆研究员叫醒，她说三明快到了。我匆匆起来，整理好行李，列车就进到站台了。我和她一起下了车，走到出站口，她姐姐和姐夫已等在那里了。我见此就要和她告别，但她一把拉住了我，向她姐姐和姐夫介绍说：“我的同行。”我赶紧寒暄，接着说要去三明市水产公司。他们说：“天还没亮呢，还是先去我们家吧。”

就这样，我真的去了他们家，还在他们家吃了点心。直至天大亮，骆研究员才让其姐夫陪我去水产公司。

从此，姚科长、骆研究员都成了我的忘年交。



当年情景模拟。



1976年春，作者游玩厦门鼓浪屿时留影。（作者供图）